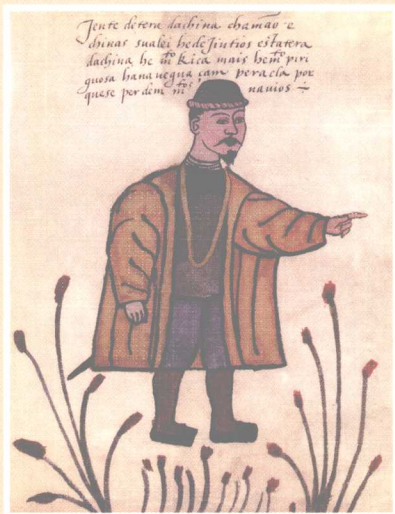


ouzhou zaoqi hanxue shi
Europ



张西平 著

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中华书局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张西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ISBN 978 - 7 - 101 - 05770 - 6

I. 欧… II. 张… III. 汉学 - 历史 - 欧洲 - 16 ~ 18 世纪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218 号

-
- 书 名** 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著 者** 张西平
- 责任编辑** 李晨光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 $\frac{3}{4}$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 印 数** 1 - 25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770 - 6
- 定 价** 56.00 元
-

导 言

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当我们抖落掉晚清的悲情,以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走向世界时,我们发现世界对我们并不太了解,特别是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观念与我们的实际生活还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图像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如何形成这样的认识的?

于是,我们就必须回到历史,回到中国和西方最初相遇的那些日子,在历史的陈迹中梳理出他们的中国知识和中国形象演变的历程。这样,欧洲早期汉学史就成为我们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尽管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像变色龙一样,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变化着,而一旦我们从根上摸到了他们东方知识的源头,一条清晰的思路就会逐步地呈现出来。

让我们抚去历史的陈迹,重新回到中西初识的时代,回到人类全球化的起点上,回到那1500年—1800年人类迈向全球化的最初岁月,在这个激荡的历史中展现中国和欧洲在精神上首次相遇后双方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变迁,欧洲早期汉学形成的历程。

今天的历史起源于1492年8月3日这个平凡的日子。这天,意大利的水手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洛斯港出发,开始一个伟大的航行。他要去寻找他的意大利同乡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香料堆积如山的刺桐港,他要代表西班牙国王去拜见遥远的契丹大汗。当1493年3月15号哥伦布返回他出发的西班牙港口帕洛斯时,岸边一片欢呼声,244天的远航终于结束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离开海

岸线最远的航行。哥伦布向人们宣称,他已经找到了契丹。实际上,他发现的不过是北美洲的海地和古巴,但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时,哥伦布名扬天下。

对《马可波罗游记》着迷的不仅有西班牙人,他的邻居葡萄牙人同样喜欢这位“百万”大人的游记,据说,葡萄牙国王唐·杜阿尔就收藏有这本书。当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垄断了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后,就开始考虑让他的三桅帆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去更远的地方,去寻找马可波罗所说的香料。1498年7月8日圣地亚骑士的首领达·伽玛率领的船队绕过了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9年7月达·伽玛返回里斯本,东方已经在望,葡萄牙人都沉浸在发现东方的欢乐之中。

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的船队驶入广州湾,1565年西班牙人莱古斯比率领他的船队占领了吕宋群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南海相遇,世界合围,全球化开始。

西班牙的传教士拉达从福建进入中国,葡萄牙的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缓慢变化的中国开始面临从大西洋远道而来的佛郎机人。

当利玛窦在肇庆脱下了袈裟换上儒袍,戴上儒冠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们找到了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文化支点。从关外刚进北京的清人对这些满口说着明朝官话的西洋人充满了好奇,顺治皇帝拜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康熙在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的帮助下每天耐心地学着西洋数学,从此,中华遍吹西洋风。

尽管讨厌和反对这些高鼻碧眼的洋人的事件不断,但在皇朝的庇护下,这个来自罗马的外来宗教慢慢地在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渗透着,发展着。当清朝的文人学士开始学习西洋历算之学时,这些欧洲来的传教士也在研读“四书”、“五经”。传教士们住在皇宫,来往于文人学士之间,他们对这个古老的国度感兴趣,他们希

望让欧洲的教会和皇室们知道,他们将征服的是一片多么神奇的土地。

于是,“四书”开始被翻译成拉丁文,《诗经》开始被翻译成法文,欧洲人在喝着武夷红茶的同时,开始读那些从遥远天朝传来的传奇而动人的书信和故事。皇族贵戚们从中看到的是皇权的无边威力;商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帝国无比的财富;教会从中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未皈依的羔羊;思想家从中看到的是世俗的生活哲学,悠久的人类历史;艺术家们从中看到的是皇家庭园的小桥流水,九曲回廊。每个人都在解读着中国,中国成为他们发展和展开自己思想的外力,成为他们解读自己文化的“他者”。

正像遥远的泰西成为徐光启的人间圣地一样,遥远的中国也成为十八世纪欧洲的天堂。中国和西方相互迷恋着,尽管期间不乏怀疑、指责,但天空仍是蔚蓝的,没有战争的硝烟,只有纯理论的分歧与争辩。

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罗马教宗的禁令激怒了康熙,康熙在多罗来华时明确地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雍正继位后禁教日益严重,乾隆继承雍正的禁教政策,使以传教士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也正在此时,在欧洲树敌过多的耶稣会受到各方谴责,罗马教廷不得不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但这个圣谕直到1775年才送到中国,罗马教廷命令在华耶稣会将其传教工作移交给遣使会。遣使会1783年正式受命,立即派了罗广祥(Rauk, Nicolas Joseph)、吉德明(Ghislain, Jean Joseph)和巴茂正(Paris, Charles)来华接管耶稣会在中国的各项工作。

18世纪后期在欧洲迅速崛起的英国出于商业的目的,希望尽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书》。

快和清王朝建立外交关系。1787年英国政府派遣国会议员克塞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大使来华谈判,但克塞卡特命运实在不好,病逝在途中。1792年英国又派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hey)率团来华,1793年8月马嘎尔尼正式进入中国大陆,9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均被乾隆拒绝,已经老态龙钟的清王朝根本没有把九万里之外的孤岛小国看在眼里,马嘎尔尼带着乾隆皇帝给英王的三封信快快而归。

这样无论从耶稣会的解散还是马嘎尔尼的访华,他们距1800年仅仅有几年或几十年,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此,1800年成为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分界线。40年后,英国的炮舰轰毁了虎门炮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是欧洲人的世纪,是西方人扩张的世纪,是东方人充满苦难的世纪,是中国人失去家园、刻骨铭心地败落而又奋争的世纪。

正是在1500—1800这三百年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中,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开始大踏步地前进,在古老的欧洲东方学谱系中开始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这个时期欧洲汉学的主角是来华的传教士。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和欧洲两个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展开着他们的汉学研究。从前者来说,他们用中文来传播西学,传播天主教,从而留下了大量的传教士汉学中文文献,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文章之精雅,足以令后世的汉学家们望尘莫及。甚至可以说,从汉学的角度来看,明清来华传教士的这些汉文写作的作品,直到今天西方的汉学家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些在中国士人们帮助下出版的欧洲早期汉学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直接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但直到今天,很少有学者从欧洲早期汉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这批

汉文作品,而仅仅将其视为中国天主教史的历史文献。这批传教士汉文文献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重性呈现出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复杂状态和欧洲早期汉学的重要特点。

从后者来说,来华的传教士们是欧洲本土早期汉学的知识提供者和重要的写作者,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们一刻也没有停下笔来,而正是他们的这些作品以及在中国用欧洲语言写作的汉学的作品,构成了欧洲早期中国知识的来源。这些关于遥远东方的知识和记载滋润了在欧洲本土研究中国的第一批世俗汉学家,或许这些世俗汉学家的作品今天看起来十分幼稚和稚嫩,但正是这些看起来简单的知识逐步奠基起欧洲专业汉学的大厦,使欧洲汉学逐步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与欧洲近代的知识汇为一体,成为欧洲现代东方学的一个重要支脉。

赛义德的《东方学》提供了我们重新反思整个西方东方知识和学术体系的新视角,在后殖民主义思想的观照下,西方的东方学失去了往日的神圣,这些曾显赫一时的西方东方学的佳篇名著都和帝国主义的东扩相联。赛义德认为西方以东方为“他者”构筑自己的精神体系,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东方学成为西方学术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它们再无真实可言,也再无任何学术意义,只是成为解读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注脚。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它成为毫不可信的一种语言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从十六世纪以后,他们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地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已经开始长期地在中国生活,并开始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研究,它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

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今天的汉学家很难相比。特别是到了欧洲“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突飞猛进,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①。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正确的,“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的表现技巧——。”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真实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它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从汉学来看,这是个常识。

当我这样讲时并不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形成的,这是对的;东方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却缺乏具体分析。赛义德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结论:因为不能因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给欧洲提供了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

^① 参阅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2001.

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地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汉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方法,揭示其方法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笔者认为,不能把欧美汉学完全归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抛弃。我们必须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和产生这种知识的权利放在一个历史中加以研究,既不能只看到知识的真实而忘记产生知识背后的权利,也不能因我们了解到知识背后的权利对知识产生的影响而完全否认知识。后现代的史学观值得我们关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有其独特的视角,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历史^①。

回到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吧,在那里我们才会看到中国的知识是如何被传播到欧洲的,看到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真实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想象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欧洲早期汉学是如何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互动中,在欧洲近代知识和思想的形成中构成一门新的学科。

让我们展开历史的画卷,重现中国和西方初识的岁月,追溯欧洲早期汉学形成的涓涓细流。

^① 也正是这样的理由,我对那些跟在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的一些宏篇大作、一些高头论章持谨慎的态度,尽管这些著作也不乏真知灼见。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	(1)
第一节 希腊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1)
第二节 罗马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5)
第三节 中世纪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8)
第四节 《马可·波罗游记》	(20)
第五节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28)
第二章 大航海时代与传教士入华	(33)
第一节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33)
第二节 耶稣会入华	(36)
第三节 道明我会进入南部中国	(38)
第三章 罗明坚的汉语学习	(41)
第一节 罗明坚在华简史	(42)
第二节 罗明坚的汉语学习	(45)
第三节 罗明坚的汉语学习成就	(54)
第四章 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合儒易佛”	(69)
第一节 “幽栖即是家，春色任天涯”的西洋奇人	(70)
第二节 “作者有西贤，异地同心理”的西洋友人	(75)
第三节 “潜心修德，以昭事上帝”的独行人	(79)

第五章 紫禁城里的西洋汉学家	(86)
第一节 大西洋国的远客——利玛窦	(86)
第二节 钦天监的洋监正——汤若望	(91)
第三节 康熙的西洋近臣——南怀仁	(97)
第四节 大清国的外交官——传教士汉学家	(106)
第六章 欧洲天文学和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117)
第一节 西洋历法在中国的传播	(117)
第二节 欧洲天仪器在中国	(123)
第三节 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127)
第七章 传教士汉学家们送给中国的新礼物:世界地图 ..	(131)
第一节 利玛窦的《山海輿地全图》	(131)
第二节 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138)
第三节 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地图的西传	(145)
第八章 身怀绝技的传教士汉学家:西方物理学传入	
中国	(150)
第一节 西洋物理学与机械学的传入	(151)
第二节 红衣大炮与明清历史的变革	(157)
第三节 西洋自鸣钟与中国近代钟表制造业	(161)
第九章 传教士汉学家们所带来的西洋艺术	(166)
第一节 紫玉凤唳箫,烟竹龙吟笛 ——西洋音乐在中国	(166)
第二节 迥出西洋臣,丹青照中华 ——西洋绘画在中国	(171)
第三节 金碧荧煌五彩合,珠帘绣柱围蛟螭 ——西洋建筑在中国	(182)

第十章 西方社会思想及文学在中国	(186)
第一节 传教士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介绍	(186)
第二节 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193)
第三节 西方宗教哲学在中国	(196)
第四节 中国文人对西方宗教思想的反映	(200)
第十一章 天主教在明清之际的发展	(204)
第一节 明代天主教的发展	(204)
第二节 清顺康时期天主教的发展	(218)
第三节 清雍乾时期天主教的发展	(227)
第十二章 传教士汉学家介绍的西学与明清之际 中国文化思想变迁	(248)
第一节 传教士汉学家所介绍的西学与晚明思想 的演进	(248)
第二节 传教士汉学家所介绍的西学与清初思想 的变迁	(257)
第三节 传教士汉学家所介绍的西学与中国的 文艺复兴	(267)
第四节 传教士汉学家所介绍的西学在中国 遭遇到的反对	(272)
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汉文写作 成就	(288)
第一节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汉文写作	(288)
第二节 明清时期对传教士汉文文献的整理 和研究	(291)
第三节 民国期间中国学术界对传教士汉文文献	

	的收集与整理	(309)
第四节	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传教士汉文文献的 收集和整理	(320)
第十四章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西传	(341)
第一节	“礼仪之争”的内容	(341)
第二节	“礼仪之争”的过程	(342)
第三节	中国和梵蒂冈的文化冲突	(346)
第四节	中国文化西传	(358)
第十五章	卫匡国与中国文化西传	(371)
第一节	卫匡国: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371)
第二节	卫匡国与明清鼎革史西传欧洲	(374)
第三节	向欧洲展现中国:《中国新地图集》	(378)
第四节	《中国上古史》对欧洲的思想意义	(387)
第十六章	《中国图说》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393)
第一节	基歇尔和他的《中国图说》	(393)
第二节	大秦景教碑与中国文字西传	(396)
第三节	《中国图说》对南明王朝的报道	(404)
第四节	欧洲“中国风”的第一页	(406)
第十七章	柏应理与中国儒学西传	(412)
第一节	柏应理生平与著作	(412)
第二节	柏应理在中国的活动	(414)
第三节	柏应理在欧洲的活动	(417)
第四节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基本内容	(428)
第五节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变异性	(450)
第十八章	来自东方的书信(1)	(461)

第一节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461)
第二节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成就	(463)
第三节	《中国近事报道》的汉学研究价值	(469)
第四节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474)
第十九章	来自东方的书信(2)	(492)
第一节	《中华帝国全志》的出版	(492)
第二节	《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文学的介绍	(496)
第三节	《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宗教的介绍	(498)
第四节	对《中华帝国全志》的评价	(509)
第二十章	索隐派汉学家——白晋	(514)
第一节	索隐派的思想渊源	(514)
第二节	白晋生平	(516)
第三节	白晋的著作	(521)
第四节	康熙与白晋的《易经》研究	(529)
第二十一章	索隐派汉学家——马若瑟	(552)
第一节	马若瑟生平与著作	(552)
第二节	马若瑟的汉语研究	(555)
第三节	马若瑟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影响	(562)
第四节	马若瑟的索隐派思想	(569)
第五节	马若瑟索隐派思想的反响及评价	(586)
第六节	马若瑟的布道章回小说:《儒交信》	(593)
第二十二章	传教士汉学与欧洲本土汉学的互动	(599)
第一节	传教士汉学家的汉语学习和研究	(599)
第二节	德国早期汉学四杰:基歇尔、米勒 门采尔 巴耶尔	(603)
第三节	英国汉学的发轫:约翰·韦伯	(624)

第二十三章 汉学的兴起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变迁	
——莱布尼茨的汉学研究	(631)
第一节 莱布尼茨与《中国近事》	(631)
第二节 莱布尼茨与礼仪之争	(644)
第三节 莱布尼茨的《论尊孔民俗》	(659)
第四节 莱布尼茨的中国哲学研究	(662)
第二十四章 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	(667)
第一节 法国世俗汉学的奠基人:黄嘉略	(667)
第二节 十八世纪法国汉学两巨头:弗雷莱和 傅尔蒙	(672)
第三节 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	(677)
参考书目	(685)
人名索引	(690)
后记	(705)

第一章 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

中国和欧洲分别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在他们之间是绵延无尽的沙漠和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在远古时代连接起欧亚大陆这两端的只能是那些在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口头的传说,游人的记载,一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西方关于中国最早的知识,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传说。随着罗马人的东征和此后不久蒙古人的铁骑向西挺进,游人在马背上踏着草原的小路来到了中国的北方,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则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南方布道。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开始从神话走向现实。《马可·波罗游记》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它奠基了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

第一节 希腊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被称为古希腊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2)在其著名的《历史》一书中记载过远处东方的中国的大体方位。他说“纪元前七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偶顿河(Don. 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Htish. R)而入阿尔泰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①为证明这个论点,他在《历史》的第四卷引用希腊旅行家亚

^① 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卷,第64页,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页,上海书店1989年。